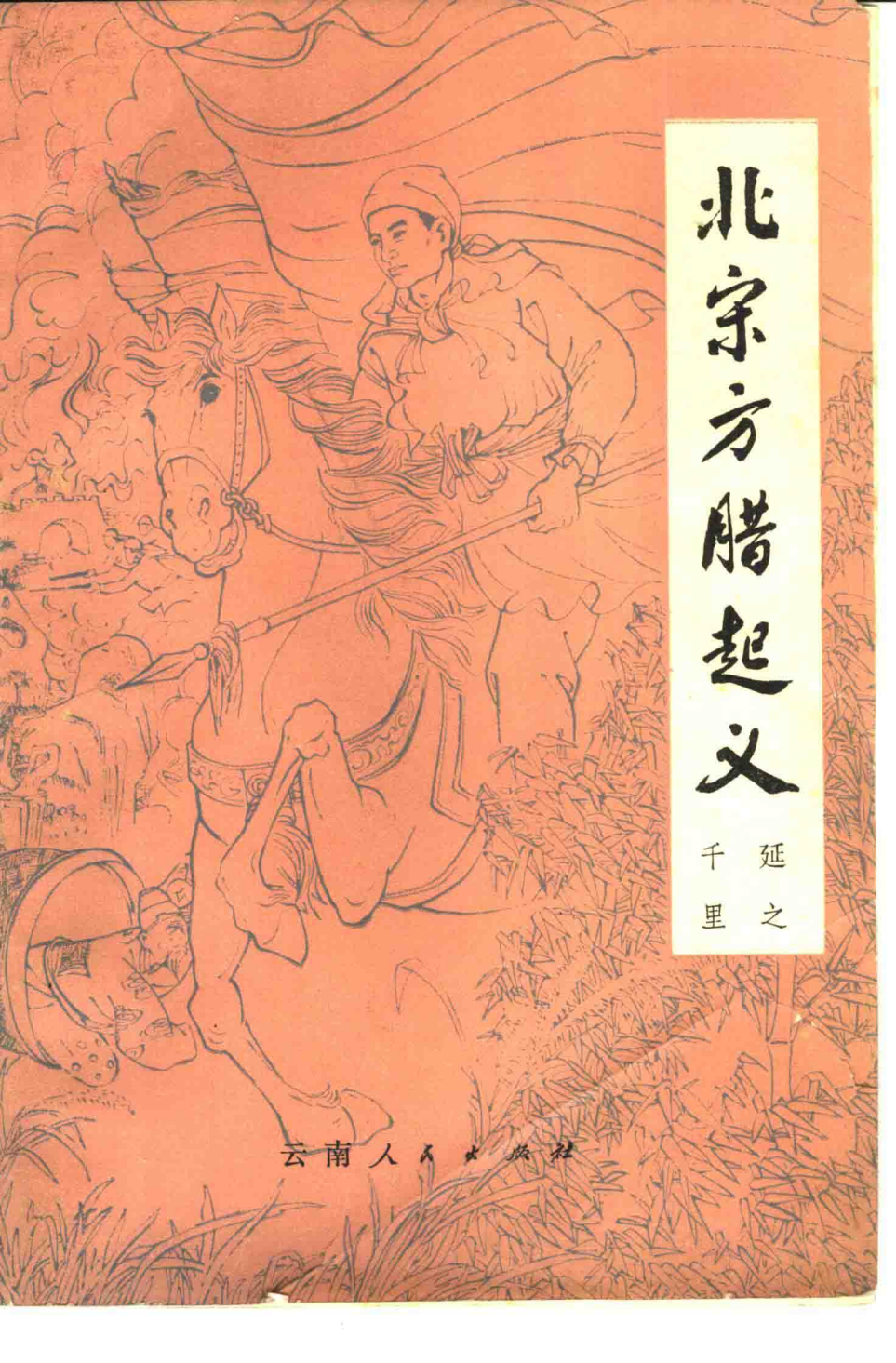




北宋方腊起义

千 延
里 之

云南人民出版社

北宋方腊起义

延之千里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昆明

北 宋 方 腊 起 义
延 之 千 里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787 \times 1092 \frac{1}{32}$ 印张: $2 \frac{3}{4}$ 插页: 1

1975年10月第一版 1975年10月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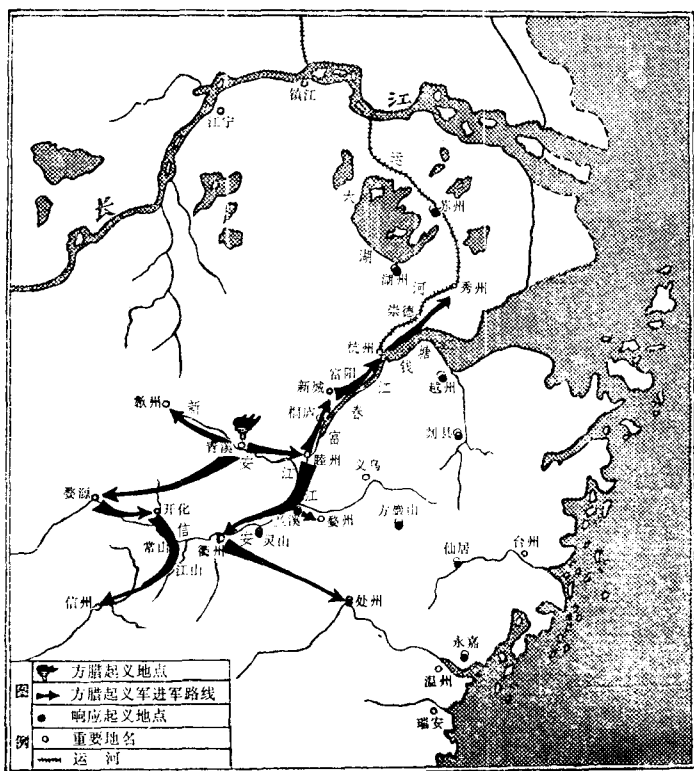
印数: 1—30,400

统一书号: 11116·34 定价: 一角九分

毛主席语录

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以汉族的历史为例,可以证明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方腊起义军活动简图

青溪——今浙江淳安。

睦州——今浙江建德。

桐庐——今浙江桐庐。

新城——今浙江城阳。

富阳——今浙江富阳。

杭州——今浙江杭州。

崇德——今浙江崇德。

秀州——今浙江嘉兴。

苏州——今江苏苏州。

镇江——今江苏镇江。

江宁——又名金陵，即今南京。

歙州——今安徽歙县。

信州——今江西上饶。

开化——今浙江开化。

常山——今浙江常山。

衢州——今浙江衢县。

婺源——今江西婺源。

兰溪——今浙江兰溪。

婺州——今浙江金华。

方岩山——今浙江温岭西北。

仙居——今浙江仙居。

台州——今浙江临海。

处州——今浙江丽水。

温州——今浙江温州。

瑞安——今浙江瑞安。

越州——今浙江绍兴。

剡县——今浙江嵊县。

永嘉——今浙江永嘉。

湖州——即归安，今浙江吴兴。

义乌——今浙江义乌。

灵山——在今浙江省。

目 录

北宋王朝的黑暗统治.....	(1)
血泪斑斑的“花石纲”	(12)
新安江上的革命风暴.....	(21)
势如破竹的胜利进军.....	(32)
汹涌澎湃的革命高潮——攻克杭州.....	(42)
北宋王朝的反攻倒算.....	(51)
方腊起义的历史意义.....	(71)

北宋王朝的黑暗统治

公元一一二〇年，浙西的新安江上兴起了一场狂飙似的革命风暴。数以百万计的革命农民，揭竿而起，在起义领袖方腊的领导下，英勇地向阶级敌人展开猛烈进攻。革命战争，像风驰电掣一般，很快便席卷两浙，震撼全国，给北宋统治东南的黑暗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它的伟烈丰功，它的悲壮事迹，是我国农民革命史上极为光辉灿烂的一章！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以汉族的历史为例，可以证明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①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正是这样。他们一举起义旗便明白宣言：起义军是不能忍受北宋的黑暗统治而奋起反抗斗争的。我们从北宋一朝的历史也

可以清楚看出，北宋王朝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当时阶级矛盾的发展，势必要导致这样一场激烈的阶级大搏斗。

北宋的阶级矛盾一开始就相当尖锐。十世纪六十年代，即北宋完成统一后不久，国子博士李觉向宋太宗赵光义指出当时的土地占有状况说：“地各有主，户或无田。富者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雨露降而岁功不登，寒暑迁而年谷无获。富者益以多畜，贫者无能自存。”^②可见土地兼并已很严重。但是北宋王朝，正如南宋人王明清说的，“田制不立”，“不抑兼并”^③，一任贵族、官僚、地主掠夺农民的土地，因而以后更趋集中。到十一世纪中叶，即号称“承平”的宋仁宗赵祯时，“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重禁莫能止焉”^④，土地掠夺到了疯狂的程度。王安石变法前夕，据当时的执政者估计，全国的已耕地中，“赋税所不加者十居其七”^⑤。这就是说，百分之七十的土地被享有封建特权不纳赋税的“官户”、“形势户”所占有，而自耕农民和中小地主才有百分之三十的土地。公元一〇六九年，王安石执政。他看到在旧制度之下，普遍都是“富者财产满布州域，贫者困穷不免于沟壑”^⑥的贫富悬殊状况，这种状况已

给王朝造成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因此，他采取法家的政策，施行一系列新法，企图抑制兼并，改良一番。但是，当时的问题已非改良所能解决，他不可能获得成功。不久，顽固派司马光等人上台，取消新法，复辟旧制度，“品官形势之家”就更加猖狂地兼并土地了。到十二世纪初年，甚至朝廷也专设官府（“西城括田所”），公然在京师邻近地区，强夺农民以至中小地主的土地。这说明，北宋的土地问题已经恶化到何等程度！

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农民的处境当然越来越悲惨。他们丧失了土地，大多数不得不沦为地主役属的依附农民——“客户”。（北宋户籍制把户口区分为主户和客户。前者包括地主、自耕农民、手工业者、商人等。）据北宋官府的记载，北宋初年的客户约当主户的三分之一；中叶，增到二分之一左右。从其他有关记载看来，实际要大得多。例如邓州五县，赵普说，“三分居民，二皆客户”^⑦。公元一〇五二年（皇祐四年），李觏说，当时的客户，“盖多于主户”^⑧。稍后，吕南公说，“大约今之居民，客户多而主户少。”^⑨《元丰九域志》说，四川各州的客户，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到七八十。还有人说，四川一家地主往往役属客户三五百家，多的到千家以

上^⑩。可见客户的数量是很大的。客户实际就是地主占有的农奴。他们和地主有“君臣之分”，受地主“鞭笞驱役，有如奴仆”，要迁移必须有地主的“凭由”，甚至女儿出嫁也要得到地主的许可。地主买卖土地，客户也随契更换主人。地主的地租剥削是非常沉重的（一般是除了地税和种籽，主客分成：客户自己有耕牛的对分，用主人耕牛的交通六成七成）。地租之外，客户还要承受地主的各种科派和无偿劳役，其困苦可想而知。

主户中的农民，景况也极悲惨。当时的户籍制度规定：农村主户，依财产多少分为五等：第一等户是大地主，一般称为“上户”，在主户总数中不到百分之十；第二、三等户是中小地主，一般称为“中户”，约占主户总数的百分之十几；第四、五等户是农民，一般称为“贫弱下户”，约占主户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北宋王朝的国家赋役和地方科差，全由下户以及中户去担负。（上户多属官僚地主的“官户”和恶霸地主的“形势户”，拥有封建特权和势力，是赋役所不及的。）赋役和科差的名目是如此繁多，数额是这样沉重，不用说贫弱下户无力交纳，就是中户也难以承担。例如，在号称最为富饶的江南地区，有所谓“身丁钱米”（即人头税）。对于这项苛税，任何

贫弱下户，即使一贫如洗，也得交纳。农民们由于交纳不起，竟普遍出现“溺婴”的悲惨现象，把自己初生的儿女活活淹死。又如差役，被轮派充役的，即使是中户人家也都被弄得倾家荡产。役户们为了规避，有的自杀，有的逃亡，有的把田产无偿地奉献给拥有免役特权的“巨室”。又如，盛产茶叶的四川，因为科索太重，甚至经营茶叶的“园户”也哀叹地说：“地非生茶也，实生祸也！”^⑪……诸如此类的记述，在北宋文献中是多不胜举的。清朝史学家赵翼概括地指出：宋朝是“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⑫。实际情况确实是这样。

在这样的残酷剥削下，农民普遍贫困化了，一般自耕农民都处于每况愈下的境地中。他们终年劳苦，男的不问寒热，不避风雨，天天起早贪黑，在田地里辛勤劳动；女的采桑育蚕，绩麻纺线，一丝一丝地积攒起来，一寸一寸地织成布帛。但总是纳不完的科差，还不清的债，“春债未毕，秋债复来。历年浸深，负债益重”，好象掉进了泥潭，越陷越深。每到收割的时候，“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⑬一年辛苦，到头来仍不免“妻子冻馁”，一家人挣扎在死亡线上。他们当中，许多人被债主“评取田产妇女”^⑭，弄得家破人亡；

许多人被债主“役身折酬”^⑮，沦为债主的“私属”客户。这就是北宋贫弱下户和客户所以越来越增多的原因。

有许多农民，不堪忍受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剥削，被迫起来反抗斗争。从宋初爆发王小波、李顺起义起，农民的武装暴动就此伏彼起地不断出现，而且随着土地的集中和农民的贫困，越来越多。在号称“承平盛世”的宋仁宗朝，群臣中已有人惊呼：“佃民聚而为盗，不能禁止。”造反的农民“处处蜂起”，“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强如一火。”^⑯面对这样日趋激烈的阶级斗争，北宋统治者不是采用什么“让步政策”，而是日益强化他们的黑暗统治。他们集中了历代的反动统治经验，进一步加以发展。一方面，加强思想上对人民的麻痹、控制，大力提倡理学，宣扬反动的孔孟之道。那些道貌岸然的理学家都是师法孔丘的“巧伪人”。他们代表大地主阶级的利益，把体现封建统治秩序的“纲常伦理”说成是永恒不变的“天理”，把人吃人的阶级压迫说成是“天命”（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要人们“存天理，去人欲”，“正心诚意”，消灭一切反抗压迫的念头。他们公然疯狂叫嚣：“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要人们死也不要反抗。这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另一方面，北宋

王朝不断扩充它的军队，把宋初二二十万左右的禁军、厢军，逐步增加到一百几十万人，用每年全部税收的六分之五去养活它。为什么养这么多的军队呢？他们的用心是极为险恶的。他们知道，农民已极端贫困，若再遇到天灾，便很可能起来造他们的反。因此，每逢水旱，他们便到灾区去募兵，把强悍的丁壮募走，剩下老弱妇孺，饿死也无法反抗。若还有人反抗，那就用这里募来的兵去镇压那里的人民。宋代官方文献《两朝国史志》无耻地写道：这样一来，“向之天下失职犷悍之徒，今为良民之卫矣（以前全国失业反抗的人，现在成了保卫地主的人了）。”^⑦真是恶毒之至！

但是，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反动的孔孟之道和庞大的禁军、厢军，固然能起一定的麻醉作用和镇压作用，然而都不能消灭阶级矛盾。相反，随着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日益残酷，阶级矛盾只能是日益加剧。北宋后期，除王安石变法革新那个短暂时期外，阶级矛盾一直是在扩大着和加深着。特别是宋徽宗赵佶做皇帝以后，剥削压迫残酷达到了极点，更加激化了阶级矛盾。十二世纪初叶是北宋王朝阶级矛盾最尖锐的年代。

赵佶是公元一一〇一年登上皇位的。他是宋朝最

荒淫无耻的独夫民贼。他搜罗一批凶残险狠的家伙作为自己的心腹爪牙，如被当时人痛斥为“六贼”^⑧的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就是他极为宠信的将相臣僚。这些人之下，又有很多大大小小的鹰犬，遍布朝廷内外，构成压在农民头上的最反动的黑暗势力。蔡京这个奸相，为了满足赵佶以及他们自己的欲望，居然提出一个恶名昭著的口号——“丰亨豫大”^⑨。这无异公开宣告：他们要榨尽全国民脂民膏，括尽一切社会财富，大搞骄奢淫逸的罪恶勾当。蔡京的儿子蔡攸，无耻地向赵佶进言：“人主当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岁月能几何，岂可徒自劳苦！”^⑩赤裸裸地暴露了这伙民贼没落、腐朽的阶级本性。在这股黑暗势力的统治之下，北宋的朝政空前恶化了。官僚人数膨胀了十倍；军队猛增到一百六十多万人；种种奢侈浪费庞大得不知其数。这就是北宋人叫做“三冗”的冗官、冗兵和冗费。宋朝的财政制度是“量出制入”，即按照支出的需要来规定收入的数量，因此，随着官俸、兵饷和浪费的增加，加重了租税赋役。据记载，北宋此时的租税赋役，不是十倍几十倍，而是成百倍地加大。如田赋，虔州瑞金从原额十多文钱，增加到两千二百多文^⑪；茶息钱总额，从宋初的三万缗，增加到四百多万缗^⑫；……增加赋税

还不足，就进行公开掠夺，如“盐钞”（官发兑盐的票据），“和买”（官府的征购）之类都成了无偿的“白著”。至于赋税以外的剥削，那就更为严重了。在赵佶和“六贼”的表率下，贪污聚敛之风弥漫全国。州县肆无忌惮地加重科索；官吏因缘为奸，恣意敲诈勒索；高利贷者利用人民困苦，乘机重利盘剥，……不能想像，农民在这种沉重的压榨下何以为生！这就不可避免地使阶级矛盾迅速地普遍激化。人民反抗的呼声在各处响起来了：

“打破筒，泼了菜，便是人间好世界！”^②

（打倒童贯，打倒蔡京，便有好日子过！）

在统治阶级中有人慑于农民的反抗斗争，也向赵佶惊呼：“……（百姓）家财荡尽，赴水自缢，客死异乡；孤儿寡妇，号泣吁天者，不知其几千万人！闻者为之伤心，见者为之流涕。生灵怨叹，皆归咎陛下。……万一有垄上之耕夫〔陈胜〕，等死之亭长〔刘邦〕，啸聚亡命于一方，天下响应，不约而从，陛下何以枝梧其祸乎？……”“山雨欲来风满楼”，北宋王朝已处于农民起义的前夕。但是，这还是泛指全国的一般形势，没有说到那更为严重的两浙路。

两浙路（即今江苏省南部和浙江省）是北宋经济发展水平最高，最富饶的地区。北宋首都开封的庞大

开支，皇室、贵族、官吏、禁军的巨额消费，很大部分是取给于这一路，因而这一路一向被称做他们的“东南财赋之区”。大运河把开封和两浙路连接起来。他们把这条沟通南北的大动脉作为一支大吸血管，源源不绝地吮吸着两浙人民的血汗。米麦，每年要漕运六百多万石；“上供钱物”，四百多万贯匹两；各种杂项税物和贵族官僚的纲运，多到无法计算。两浙人民被榨取得贫困不堪，和美丽富饶的江南适成尖锐无比的对照：“吴盐胜雪”，滨海农民却家家淡食；鱼米之乡，贫弱下户却以糠秕充饥；……可是，这还不是苦难的顶点。公元一一〇五年，反动统治者给两浙人民带来了更大的灾殃。罪恶的“花石纲”进一步把广大农民推进了水深火热的深渊。什么“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对于被压迫的人民，两浙已成了人间地狱！但是，也正是这罪恶的“花石纲”，最终激起了两浙农民的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

一册惊心动魄的革命史诗，一幅鲜血染红的革命图卷，就从这里向我们展开。

注：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②、⑦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